# 第一章　家世和童年

谭氏出于春秋时的谭国（今山东章丘市）。据谭氏族谱记载：嘉兴谭氏的先人是明初从湖南迁至浙江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市)的,大约在明朝弘治(1488—1505 年)、正德(1506—1521 年)年间，谭仲斌迁至嘉兴，成为嘉兴谭氏的始迁祖。但谭其骧在 1987 年 5 月 18 日所写谭氏世系称：“山阴谭氏于南宋初迁自河南西平，传七世有讳定者，避兵役移居嘉兴，是为嘉兴谭氏之始迁祖。西平以前无考。”看来,谭氏自山阴迁至嘉兴,时间在明中叶是没有问题的。

嘉兴谭氏的第六代是可贤、可教俩兄弟,可贤一支到万历年间出了一位进士谭昌言（八世），官至常熟知县、山东莱登道副使。其子贞默（九世）于崇祯年间中进士。十世有谭吉璁，官至山东登州府知府，康熙年间举博学鸿词。这是谭氏最辉煌的几代，使谭氏成为嘉兴的望族。谭昌言时还确定了此后子孙按“贞吉有孚,君子之光,日新其德,衍泽维长”16 字排行(《谭氏家谱》所载 16 字的前 8 字为‘文章华国,诗礼传家”,但从实际名字看，显然没有采用此八字)。但从此以后,谭氏长期衰败,“百年之中几无一个青其衿者”，连秀才、举人都没有再出现。经济上的拮据更使族人外出谋生者增加，往往就此不知所终，在族谱上只能注上‘失考”。还有好几支‘不娶无嗣”,看来主要也是因贫困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致。到太平天国时期，可贤一支在嘉兴的族人只剩下 30 多人。

## **盛极而衰的家庭

可教一支则一直默默无闻。在谭昌言中进士时，这一支的八世祖谭正言却已弃学从商，只是因经营不善，屡屡亏本，以至家业凋零。其子贞谅在商场一度得手，但由此招致族人疏远和反对，最终仍归失败。以后屡世务农，生活贫困，直到第十四世谭子铨又“弃儒服贾”。谭子铨的经营本小利微，临终时仅给年少的之松兄弟三人留下一家京货铺，家产总共才值 600 串钱。道光八年(1828年),谭之松(声扬)将京货铺交给弟弟,自己创办成衣铺,但第二年嘉兴大灾,粮食歉收,市面萧条,成衣生意清淡。谭之松死后，20 岁的长子光熙率兄弟 4 人全力经营，经过 20 年努力,终于事业有成,不仅在嘉兴站稳脚跟,还将业务扩大到苏州一带。咸丰十年（1860 年),太平军逼近嘉兴,正在苏州经商的谭光熙星夜赶回嘉兴，集合族人，外出避难。谭氏家族先后避居桐乡晏城、平湖新仓，最后到达上海。当时上海已聚集大批江浙富室巨商，谭光熙感到发展余地有限，当他得知汉口局势已趋稳定，与战地的物价有很大差额时，当机立断，包租一艘外国轮船,兄弟 5 人迁往汉口。他们到汉口后就开设了估衣铺，买卖旧衣物。由于在战乱中富户抛弃变卖和军队盗匪劫掠到的衣物饰品极多,无不急于脱手,故他们低价收进,高价售出 或者在汉口购进，运往上海出卖，获利丰厚，数年间资产猛增。同治三年(1864 年),战争结束,谭光熙兄弟衣锦还乡,举家东归。谭氏兄弟分别在嘉兴、上海、松江设店,合力经营,成为嘉兴首屈一指的富商。光绪五年(1879 年),谭氏兄弟以 15800 两白银的巨资

建成谭氏祠堂和慎远义庄，是当时嘉兴城内最大的建筑。他们又在平湖县购置义田 1020 亩，用以维持祠堂和义庄的日常开支,如祭祀祖宗,祭扫祖坟,修造家谱,赡养贫困族人,资助子弟教育等。兄弟 5 人又在杭州灵隐寺后购置坟地，死后合葬于此。谭氏家业鼎盛,社会地位也显著提高,如谭光熙的侄儿日休(光勋之子）娶大臣许景澄之五妹为妻。

潘光旦先生著《明清嘉兴的望族》一书,将谭氏也列为其中之一,谭其骧却不以为然。他生前曾对我说“:潘先生写此书时，我曾送他《谭氏家谱》一套,这或许是他将谭氏列为望族的原因，其实我们谭家是算不上的,与嘉兴的其他大族不能比。’他认为谭氏这两支,一支自康熙以后就没有出过什么人物,另一支只是在同治间暴发，但很快衰落，所以并不是真正的望族。

据说谭氏兄弟当初选定灵隐寺后这块‘ 吉地 ’时,风水先生看后连连说好，但又说万一今后灵隐寺的屋脊超过了坟地的高度就会败了谭家的势头。为了此事，谭家专门请人到灵隐寺大殿内观察,见屋柱所用木料已经十分高大,大家认为即使今后再造大殿也找不到更高的木料，屋脊无论如何不会超过坟地。岂料以后灵隐寺大殿因失火重建时，竟从美国进口了高大的洋松，重建成的大殿屋脊居然超过了坟地。这使谭氏族人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不久家道果然中落。到了文化革命,这块与谭家兴衰攸关的坟地已被夷为平地，荡然无存了。1983 年 5 月 27 日,谭其骧在主持杭州大学地理系研究生答辩后游灵隐寺，顺便寻访曾祖父的墓地,见坟地上已建为自动化研究所。询问故老,则仍称此处为‘ 五坟台 ”,尽管他们已不知道墓主是谁了。

其实,使谭家的产业受到最沉重打击的是火灾,汉口和上海的估衣铺都曾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嘉兴的店铺也曾遭受火灾。

而使谭其骧家这一支败落的祸首却是他祖父谭日森。



图 1　谭其骧的祖父谭日森（1862～1918）

光字辈五兄弟共有 10 个儿子，即日字辈 10 房。长房、三房定居上海，二房曾居上海，但不久就迁回嘉兴，其余各房大多在嘉兴。

谭日森是日字辈第八房，字蔼如，号爱萱，生于清同治壬戌（1862 年）八月，光绪甲午（1894 年）中了举人，成为谭家弃商人学的成功者。历任清朝驻欧洲各国公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许景澄曾请谭日森担任他的私人秘书，代拟书翰，但时间不长。谭日森娶比他年长 7 个月的平湖朱氏，生有一子二女。光绪庚子（1900 年）闰八月朱氏卒后，谭日森又娶继室钟氏。钟氏生于同治丁卯（1867 年），生一女。后又娶侧室汪氏。谭日森讲究排场，又好赌，父辈创下的一份产业，在谭日森手中已挥霍殆尽。当时嘉兴城内的几位举人都是有名的赌客，所以城里人称举人为“赌鬼”（嘉兴方言“鬼”读如“举”）。



图 2　谭其骧的父亲谭新润（1881～1935）

谭日森的独子新润生于光绪辛巳（1881 年），字公泽，号步声，又名蒲生、蒲僧，别署谭天、天风。



图 3　谭其骧的母亲王文毓（1880～1963）

谭新润于光绪己亥（1899年）娶王文毓为妻，次年二月生下长子其玉。王文毓是江苏吴江县平望镇人，她的大姐嫁给盛泽郑家（世泽堂），生下郑之藩（桐荪）和郑之瑛（佩宜），郑桐荪是著名数学家陈省身的岳父，而郑佩宜是柳亚子的夫人。与上一辈一样，王文毓也长谭新润一岁。就在谭新润考取秀才不久，清朝宣布废除科举，一时间浙江士人纷纷东渡寻找出路。谭日森和谭新润父子都加入了留学日本的行列，谭日森不愿意学日语，好在日本为吸引中国留学生，设有不需要讲日语的学校，谭日森选择了这类学校学习警察事务，不久就返国。他回国后并没有当警察，却凭着举人和留学生的双重身分当了嘉兴府学堂监督。以后退休在家，1918 年病故。谭新润入东亚铁道学校攻读铁道管理，毕业回国后应聘任京奉铁路皇姑屯车站站长。

谭日森的三个女儿，长女家璜和次女家骧都是朱氏所出，家璜适海盐大族兼富商三乐堂冯氏季侯，家骧嫁嘉善监生孙家。三女为钟氏所出（一说系领养），名不详，字馥芝，适本地世代业医的金诵盘。金诵盘先在嘉兴开诊所，以后到上海行医，与戴季陶私交甚深，经戴的介绍而为蒋介石治病，以后在南京国民政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军医署任职。金诵盘的儿子就是前几年因被蒋纬国称为结拜兄弟而名噪一时的金定国，但谭其骧第一次在《团结报》上见到这条消息，着实吃了一惊，因为他以往只知道这位姑父为蒋介石治花柳病，却从未听说过他与孙中山有如此深的关系，更不是什么“四大干部”之一。谭其骧生前多次告诉笔者，他这位表弟的“回忆”和由此产生的大量报导只能当小说看待。

皇姑屯车站本来只是奉天(今沈阳)城郊一个普通小站，以后因张作霖在此被日本特务炸死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点，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六日(1911 年 2 月 25 日)谭其骧就出生在皇姑屯车站站长宿舍。当时，谭新润已有三子二女，谭其骧在儿子中排行第四，按家族大排行取名其骧，以“虎步龙骧”之义，字季龙。因生在奉天，号奉甫。第二年谭新润因突发脑血栓而无法工作，只能辞职携眷南归，所以奉天和皇姑屯车站没有给谭其骧留下任何印象。直到 1983 年 9 月出席东北民族史讨论会时，谭其骧才第二次来到沈阳，但当年的皇姑屯车站早已成为历史陈迹，车站一带也已融入沈阳市区。当他在沈阳农学院任教授的弟弟谭其猛与他见面时，兄弟不胜感慨，谭其猛说：“你是生于斯，我是死于斯。”谭其猛是 1952 年院系调整时由复旦大学农学系北调沈阳的，30 年后已不作南归的打算，此话自然是实情。但兄弟俩都没有料到，这次见面竟是永诀，一年多后谭其猛就病逝于沈阳。

谭新润回嘉兴后，在家养病多年才逐渐痊愈，但已落下了半身不遂的残疾。他在嘉兴县公署当了几年科员，又担任了一年多由嘉兴商界主办的《嘉兴日报》的主笔，1924 年江浙齐卢战事起，报纸停办，就一直赋闲在家。谭家住在嘉兴城内芝桥街 24 号，是谭日森置下的一幢二层楼房，有二三百平方米的面积，加

上谭家人口多，给外界的印象依然是世家大族。当年在谭家后门外住着一位青年‘郎中’(中医),他就是以后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唐兰。唐兰对这家高邻就有这样的印象，所以解放后谈及谭其骧家时还说：“我怎么能与他家比呀！他家摆出来的马桶都有一长排。”实际上由于谭新润长期患病，又没有固定收入，坐吃山空，谭家已只剩下这座房子的外壳了。谭其骧幼时听得父母发生争吵时，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一家人家已经败完了,还吵点啥？”

谭新润善诗词,曾参加南社,《南社丛刊》载有其作品。自定有诗文集《弯弧庐集》(因中风后言语不清,家人以嘉兴方言戏称之为‘弯葫芦’,遂以其谐音为室名),姨甥婿柳亚子为之作序,但未刊印，在抗日战争中散佚。

谭新润学贯新旧，兼通文理，谭其骧自幼耳濡目染，获益不小。例如他们兄弟之间，常以全国地名互相考问，某地应在某省,某县周围是哪几个县,然后以地图或书籍核对,确定胜负,这自然与当过火车站站长的父亲有关，但无形中使谭其骧增加了对地理的兴趣。由于谭新润当报纸主笔，使他家成了嘉兴第一批电话用户，给少年的谭其骧打开了一扇现代文明的窗户。

## **发蒙海盐　求学秀州

谭其骧 5 岁时，家里已有兄弟姐妹 8 个：谭其骧的大哥其玉(麟伯,号迦甫,生于1900 年)、大姐其端(淑庄,生于 1901 年)、二姐其昙(优华,生于 1903 年)、二哥其来(斌甫,生于 1905 年)、三哥其翔(勉之,号勉甫,生于 1908 年)、大弟其猛(啸甫,生于1914 年)、二弟其飞(忌飞,盛甫,生于 1916 年)和他本人,母亲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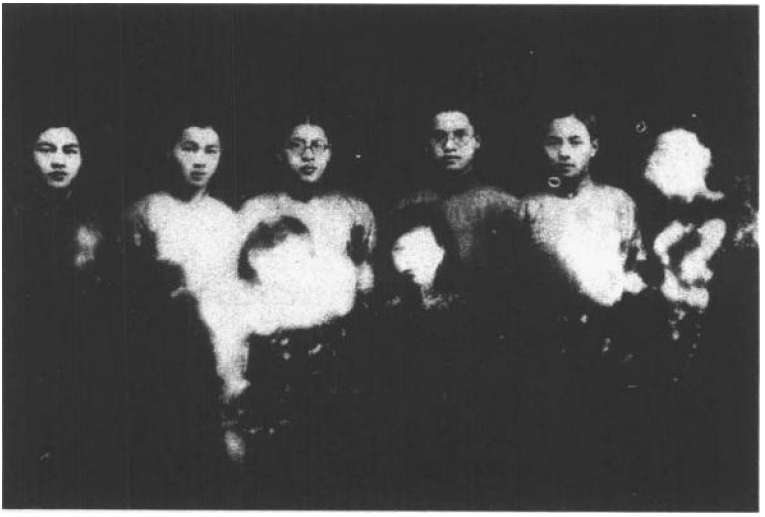


图4　1933 年春节谭氏兄弟姐妹合影，这是谭氏兄弟姐妹成人后少有的一次团聚，也是目前留下的唯一合影，可惜已经残缺。后排自左至右为：其猛（1914.3.7 ~ 1984.2.10）、其飞（1916.4.23 ~ ）、其来（1905 ~ 1950），其骧（1911.2.25 ~ 1992.8.28）、其玉（1900 ~ 1966）、其翔（1908 ~ 1991.12.18），前排自左至右为其端（1901.5.6 ~ 1971.2.8）、其昙（1903 ~ 1978.2.22）。目前 82 岁的其飞硕果仅存。

以照料。海盐的姑母只有一个女儿，遂将他接至海盐冯家寄养，第二年随表姊入家馆识字。冯家为海盐巨室，又是开酱园的富商，所居绮园，俗称冯家花园，擅名浙中。谭其骧在冯家住了 3 年，姑母因自己无子，想立他为嗣，姑父也赞成，但遭到族人反

对,只得作罢。60 年后的 1985 年 10 月,谭其骧应海盐县县志办之邀参加学术会议,期间曾重游绮园,题词勒石园中,记下了他这段经历和感想:

> 海盐城中旧有朱氏、徐氏、冯氏三巨室,宅后皆附有园林,池沼亭榭,各有佳致,而冯氏园尤以巨石乔木见胜。自抗日战争以来,迭经世变,朱徐二园已归夷灭,独冯氏园幸免于难,解放后遂辟为公园,以绮园之名驰誉江南。余幼年曾寄养于适冯氏姑母家中,自一九一五年春至一九一八年春凡历三载。六十余年来,园中景物,时萦梦怀。今蒙海盐县政协、文化局、博物馆之邀,得重游旧地。睹兹胜迹依然,既不胜怀旧之感,又见于旧构破损处多所增饰,对当地领导维护文物之功,尤深钦佩。

姑父母虽未能立他为嗣,但对谭家的资助一直没有减少,特别是在谭其骧上大学期间。另一方面,谭新润对冯家立嗣一事仍未绝望。1933 年 7 月,姑父冯季侯突然病故,生前所留遗嘱没有提及立嗣,谭家的一线希望才最后破灭。对此,谭新润在 8 月 22 日的家书中有详细的叙述:

> 二姑丈之变,初时误传为时疫,现经盛儿(笔者按:谭其骧的弟弟谭其飞)前往送殓,回述始悉实系一种伤寒症,自起病至终,先后共得十天。得病在杭女婿朱丹卿寓中,初起时每日起居饮食一切如常,故绝不介意。不料至月之十日,午膳(当日饭量陡增)不即行□□□之毕业□,病势剧变,即神智糊涂,口噤不言。至是即问公路局借救护车,由丹卿夫

妇等伴送回盐。无如仍旧不及到家，途次即在车中断气，亦可怜乎！现在领帖不知何时，惟二姑丈已在前年立有遗嘱，也有律师证明。因盛儿为我之代表，故于入殓后即由其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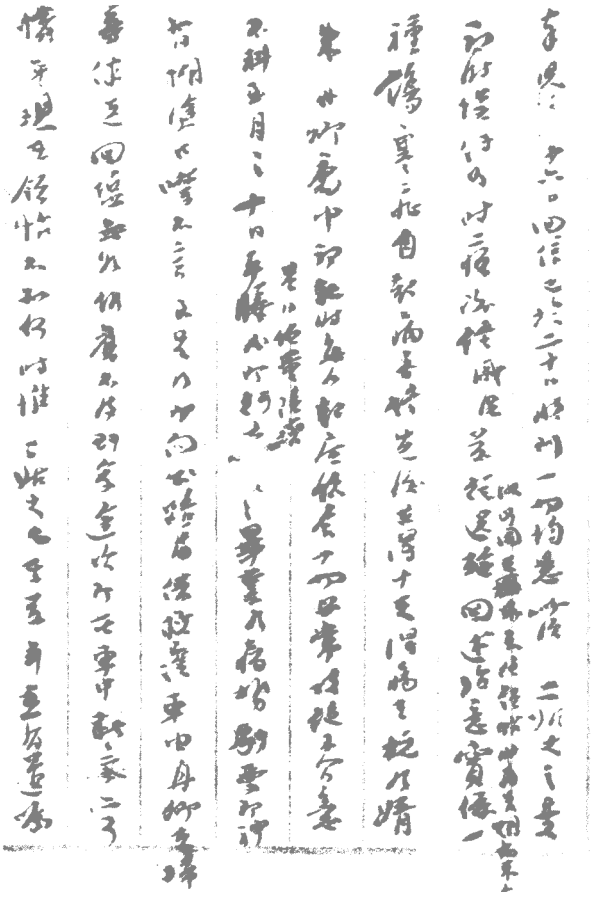


图 5　谭新润 1932 年 8月 22 日家书手迹

辈娘舅金□斋领同盛儿，再邀集彼家各房子侄等全体开读。据盛儿云：遗嘱分正副二份，正式一份寄在上海某银行之保管库内，中有律师签字。此次所见者系副份，亦属姑丈亲笔,惟少律师签字。大致谓所有伊留下之家私作二股分配,一与奎□,一与大、二、三三房均分之。立嗣何人,则一字不提。

谭其骧回嘉兴后，即进谭氏义庄所设私立谭氏慎远小学，仍




图6　对秀州中学，谭其骧怀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这是他的母校，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他一度十分痛恨并坚决退出的一所教会学校。但时过境迁，秀州中学已是旧貌新颜，1985 年 6 月 8 日，谭其骧以杰出校友的身分回到秀州中学，与陪同他的儿子德垂(左)、侄儿德铨(右,谭其来之子)合影留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从一年级读起。在读完三年级时，谭新润嫌他上学太迟，让他跳班进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 1923 年秋,谭其骧由高小毕业,考入基督教会所办的秀州中学。当时嘉兴城内只有两所中学，一所是省立第二中学，离谭家相当远；另一所就是秀州中学，就在谭家后门附近，步行仅二三分钟，所以就考入了秀州。入学后第一年读的是旧制，是不分初高中的四年制。第二年改行新制，即初中、高中分段，各三年。学校采取考试分班的办法，读过旧制一年级的学生经考试，按成绩高低分入高一或初三，这使谭其骧在读了一年中学后就成了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 第二章　短暂的革命和大学生活

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 五卅惨案 ”,引起了全国各地的反帝高潮。离上海不远的嘉兴很快受到影响，在一向平静的秀州中学里，开始出现反对学校当局的言行。当时,谭其骧的大哥其玉在上海工厂当职员,常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带回家中，使他从这些刊物中接触到了革命思潮，更激起了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仇恨。 1926 年夏，在高二下学期即将结束时,为了抗议学校对学生的压制,谭其骧和班里一些同学同盟退学。后来有的同学在学校和家长的劝诱胁迫下复学了，但谭其骧和另外几位同学仍坚持退学。就这样，他在不满 15 岁时就结束了中学生活。

当时谭新润已失业在家，全部家产只有一所房屋和一二千元股票，就靠一半房屋出租的租金和股票的红利维持全家十多人的生活，处境相当窘迫。谭其骧的大哥毕业于中等工业专科学校,二哥、三哥连中学也未毕业,大姐、二姐只读完小学。在谭其骧退学后,正好上海一家无线电公司招收练习生,家中就要他去报考,但他对无线电毫无兴趣,就故意不认真考试,结果自然没有被录取。他不愿再上其他中学,就到上海,考入了上海大学社会系。

按照家里的经济条件，谭其骧无论如何是上不起大学的。但就在前一年，谭氏宗族义庄作出了一项新的规定：凡族中子弟就读中学、大学者，每年均给予 100 元的补助。他的两位姑母又答应每年资助 100 元，加上家里挤出几十元钱，才凑足了学杂费和食宿费，使他成为兄弟姐妹中第一位大学生。以后他的两个弟弟其猛、其飞也这样读上了大学。

## ** 革命大学中的革命生涯

上海大学由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等人创办，是当时上海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堡垒，也是共产党人培养进步青年的基地。但上海大学在社会上的名声，自然不能与其他名牌大学相比，在守旧者的眼中，更是一所很不正规的“野鸡大学”。因此谭其骧的许多亲戚长辈都反对他报考。好在谭新润毕竟受过新式教育，对新事物并不反对，对子女的兴趣爱好一贯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从不干预他们上什么学校、选什么专业，以至在谭其骧读大学二年级时，他还不知道儿子学什么专业。因此尽管反对者居多，谭其骧还是自作主张进了上海大学。

当时上海大学已在郊区江湾建新校舍，临时校舍和学生宿舍则还分散设在闸北青云路宝山路口的几幢民房里。谭其骧住在宝山路西一条弄堂的宿舍内，在他内室有一位来自江苏南通的中文系同学于绍杰。由于房间小，于绍杰每次进出时都要从谭其骧的铺前挤过。于绍杰是目前所知谭其骧唯一一位健在的上海大学同学，是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的离休干部。80 年代上海大学重建时，曾在上海寻找当年上海大学旧人，据说在上海仅找到谭其骧与施蛰存两人，而施是上海大学的教师。当时主持校

务的是陈望道,教授主要有李季、施复亮(存统)、郑振铎、沈雁冰(茅盾)等,曾经担任过教授的瞿秋白等已经离校。上海大学有共产党和共青团(CY)组织,谭其骧进校不久就参加了共青团。除了开会、讨论等活动外,共青团员经常在闸北一带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在马路上和茶馆中向群众演说。孙传芳的“大刀队”不时出没,团员们得随时注意,一有动静就散入小路,或从弄堂中溜走。

1927年春新学期开学,学校迁至江湾,但北伐军已逼近上海,时局紧张,没有开课。谭其骧和同学们成了职业革命家,天天在闸北街头作宣传。3月21日,上海工人配合北伐军,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上海大学同学跟随队伍呐喊助威,并参加救护伤员。在攻打北火车站时,一位指挥员让谭其骧随同,临时发给他手枪一支,但不久车站就已攻克,他的手枪还没有使用就交回了。北伐军进入上海后,谭其骧和同学们又多次参加群众大会,他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振奋之中,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对即将到来的反革命风暴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每年清明,谭氏合族老小都要去杭州扫墓,往返费用和在杭州的食宿都是由义庄负担的。17岁的谭其骧舍不得放弃这个免费游玩杭州的机会,作为一名普通团员他也不了解局势的严重性,就在4月初向团组织请假去了杭州。他和家人在杭州住了一个星期,归途中又在家乡嘉兴停留了几天,回到上海已是“四一二”政变以后,上海大学已被蒋介石当局封闭。谭其骧从学校取出行李寄存在大哥处,带上随身用具,过上了革命流浪生活。为了与组织保持联系,也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他们几乎每天换一个住处。最后,他和一位姓康的宁波籍同学住进了一位负责同志租的公寓,这位负责同志因风声很紧已在事先撤离。

两三天后的黎明时分，一伙拿着手枪的便衣闯进屋来，当发现他们要逮捕的人已经不在时，就抓走了谭其骧和康某。他们被押送到设在引翔港一所停办的医院里的宪兵司令部，分别囚禁，被提审了几次。由于所有的文件事先都已销毁，宪兵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他们又不是搜捕的对象，所以每次提审时只是恐吓诱骗。他俩自然不会上当，一口咬定是因为学校被封，没有住的地方，才住到那人的空房中去的。一星期后，同学陈广云得到他们被捕的消息后，立即通知了谭其骧的大嫂。大哥闻讯后赶到宪兵司令部营救，经办人大概觉得这两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没有什么油水,在收了 100 块钱后就同意保释。

出狱后,康某回了宁波,谭其骧暂住在曹家渡他大哥的工厂里。他两次到闸北寻找组织，但所有认识的同志都已转移，没有得到什么线索。这时，家里得知他的消息，来信催他立即回嘉兴。在上海没有工作，大哥厂里也不便久住，他只得返回故乡。

## ** 暨南三年

两星期后就到了暑假,谭其骧决定重新报考大学,结果考上了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他之所以选择暨南，是考虑到自己高中少读了一年多，大学一年又没有上过多少课，要考名牌大学把握不大，而暨南大学虽是国立，却以招收归国华侨子弟为主，录取要求相对较低。

开学到暨南大学报到后，谭其骧仍然没有放弃与组织接上关系的念头。有一次偶然打听到上海大学一位同学的地址，他估计此人与组织有联系，就给他写了信，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几个月下来，连熟人都遇不到一个，他绝望了，给短暂的革

命生活划上了句号，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谭其骧晚年曾与我谈及这段经历,我问他“:要是当时与组织接上了头,你会不会再干下去 ?”他说“:当然要干。”四·一二后,蒋介石镇压共产党很厉害,共产党人被抓被杀那么多,你就不怕吗 ?”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过。”我说“:如果你那时找到了组织,继续参加革命,现在大概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了，至少也应该是部长级干部。”他想了想,笑着说“:但也许早就死了,或者成了党内的反革命。”是的,历史是无法假定的,但无论如何,历史使他错过了革命的机会，却给中国造就了一位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

暨南大学在上海西北郊的真如，校长是郑洪年。开学后第一学期，中文系主任是夏丏尊，他自己教一年级国文，余上沅教英文,沈端先(夏衍)教第二外语日文,开课的教师还有林语堂、张凤等。夏丏尊一贯提倡新文艺，上课讲的也是新文学，因而深受谭其骧的尊敬和欢迎。直到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夏丏尊上第一课时首先声明自己的名字是丏尊,不是‘丐’尊;“丐”读音“缅”,意思是被遮蔽,看不见 但没有说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字为名。谭其骧对新文学的兴趣很大，假日常到福州路书店买小说和文学期刊，还尝试写过小说。其中一篇曾在某刊物发表过，可惜以后他自己也忘了题目和内容，更记不得是哪一刊物，或许永远无法找到了。夏丏尊对青年学生十分热情，谭其骧也乐意和他亲近，常在课后找些问题请教。夏丏尊对谭其骧的习作很赞赏，学期中间曾带领他和班上同学到市区一家餐馆与鲁迅见面，聚餐前进行了座谈。解放后，曾经参加过座谈的中文系同学黄永标还清楚地记得鲁迅谈话的内容，接受过不少次采访。

这位黄永标一度出家为僧,因而被谭其骧称为‘和尚同学”,文革前后不时到谭其骧家中走动，谭其骧常在可能条件下给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